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Eth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翁, 世平
Publisher	中国伦理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02 19:01:22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2273">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2273</a>

# 翁世平：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

翁世平

[内容提要] 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成分，决定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在阶级性、进步性和标志性上体现其共同本质。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相融互动的运行机制，具体表现出二者有着中枢与网络契合、刚性与柔性互补的结构性特征，同时具有前者主导后者发展方向，后者涵育前者生长根基的功能性特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些本质关联，有助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实践中，辩证把握“德法并举”治国方略，有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政治文明 道德文明 互动 德治 法治

—

政治文明，是指人类在政治实践领域的进步状态，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运用各种手段来调整和处理阶级内部、阶级之间，以及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积极成果，表现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主体、政治思想、政治行为等。道德文明，则是指人类在道德生活领域的进步状态，是人们凭借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积极成果，表现为一定社会的道德信仰、道德规范、道德观念和道德风尚等。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sup>[1]</sup>政治和道德都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因素。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内在相关性，首先是由它们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基本要素的同质性特征决定的。

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经济关系直接表现为阶级关系。各阶级的特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有着各自的利益，形成社会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别和对立，并产生出反映本阶级利益要求和意志的政治主张、政治行为，以及道德原则、规范及道德评价等，呈现鲜明的阶级本色，因而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都是以一定的阶级利益为存在基础，共同成为实现阶级利益的有力工具。

进步性。“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sup>[2]</sup>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人们创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道德关系，以及相应的思想趋向、价值观念、思想学说等等。纵观历史，后一发展阶段斗争实践的成果总和与水平，总是超越、高于前一历史阶段的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自由、人权等日益向最广大人民群众普及、深入实现的社会化历程，在道德上表现为人类自律精神日益全面反映自身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日益正确体现人的社会本质，“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sup>[3]</sup>的上升性过程。

标志性。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相互交织、渗透、涵摄，又彼此在对方中求得实现，以至被整合、提炼、上升为治国模式的标志和象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意识形态能动作用发挥的不同，以及民族文化历史源流的差异，中国和西方的治国模式和传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尚书》有云：“道洽政治，泽润生民。”自西周初年到晚清末期，中国众多思想先贤和历代君臣先后提出过诸如德治、礼治、道治、文治、武治、法治等主张。其中，“德主刑辅”、“以德主政”的思想成为历史主流，从而形成了中国历代政治与伦理融为一体的“德治”（伦理性政

治)模式。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后来的许多思想家,十分重视政治的道德底蕴,主张从伦理价值来解释人们的政治诉求。如柏拉图认为“理想国”就是“公道或正义之国”,“公道是灵魂的至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最高的善”,政治的目的就是为实现最高、最广泛的“善业”。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形成了与中国不同的“法治”(法理性政治)传统,其中贯穿着特有的道德教化底蕴,并使道德文明从属、渗透于以法治为主导的政治文明中。中西治国模式和文明传统的优劣纷呈互现,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实践中,以科学的态度分析、批判、借鉴和继承、创新。

## 二

把握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同质性特征,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分析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得以相辅相成的异质性特征。

有机契合的中枢与网络。政治与道德都是诉求价值观念的表达方式。在利益有着差别以至互相冲突、以多元价值体系并存的社会里,道德往往以其普适性、兼容性和自发性植根于社会成员内心信念、风俗民情之中;政治则以对根本利益、重大问题的体现,具有集中性、整合性和统御性,由社会统治力量上升为强力意志,构成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位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中枢,并对其他社会成员各种价值观念体系幅射、制约以至吸纳、交融,不断整合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从而主导社会价值体系,引导社会生活向既定方向运行。这种整合过程形成政治与道德的动态联系,促进社会合力的形成。

互为补充的刚性调控与柔性调控。政治与道德都是维系社会关系的文化纽带。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集团,为了统一意志,实现根本的利益目标,不仅需要通过政治文化的纽带,以权力的集中、制度的约束和法律的强制,来保持君临社会的权威和张力,同时也十分需要通过道德文化的纽带,以伦理理念的认同、人伦诚信的倚靠、人际交流的畅达和人格榜样的服膺,来粘合、传输和维系上层统治力量与下层社会基础的基本联系,形成凝聚力和感召力。政治,集中表现为以国家权力、法律制度,以及相应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国家机器等强制性力量实施社会调控,而道德则凭借社会舆论、人们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这种软调控的方式,使人们相互监督、制约和自我检点。刚性的调控与柔性的调控单独运用都不是万能的,唯有两者的结合互补,才能有效实现社会的规范有序。

政治文明主导道德文明的发展方向。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6]政治,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社会集团的重要意志,以权力和法律为后盾,对经济产生直接的、强有力的影响。同时,政治文明是以自觉的、理性的和高水平的奋斗目标、理想信仰和价值观念,对以道德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支配人们的道德理想、道德规范和舆论准则,决定道德文明的主导方向,并成为道德文明的先导。“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新社会的助产婆”。在社会重大变迁之际,往往是以新的政治文明为其鸣锣开道,并由此开创新的道德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功,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促使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发生历史性转换。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人,焕发极大的政治热情,促成新中国社会文明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巨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代表的新的政治文明成为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重要前提,充分显示出政治文明对于道德文明的主导作用。

道德文明涵育政治文明生长根基。道德文明借助于传统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内心信念等形式,通过“自律”精神规范人的行为,来调节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道德不仅通过社会传媒、形成普遍舆论,造成社会控制力,而且以“道德法律化”的形式,使自己的一些规范逐渐上升为

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形成社会意志，这是为民主法治、政治文明所做的直接准备；而且，道德文明在日积月累的传递中潜移默化，使政治文明广泛植根在社会民众的心中，并与政治文明不断提供文化生长的资源，共同构成治国安邦的价值体系。孔子在《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道德对政治的化育功能。老子《道德经》中写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6]有序地揭示了道德走向政治，遵循从个体到家庭、社群，进而到国家、社会这一化育的渐进过程和转换、扩展方式。

### 三

进入新的世纪，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已经跨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发展，自觉运用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融互动的辩证关系，引导和保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向既定目标前进。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就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7]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我们才能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始终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决不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只有如此，才能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政治基础，为建立、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创造必要条件，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大力加强政治观念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清醒面对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国际环境的挑战，坚持以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实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导向。市场经济形成了新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全方位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全体成员自主创造、公平交换、竞争向上和自律发展的大舞台，并推动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不断创造新的内容。

但是，一些市场主体的本位性、唯利性，其行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导致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蔓延，一些人政治信仰缺乏、道德观念畸变，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坚持核心价值观念的主导作用，才能真正建立民主、平等、诚信、和谐的政治、道德、文化环境，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必须保持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时刻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倾销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宣扬“黄、赌、毒”等腐朽颓废的西方文化，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

我们既要积极地学习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更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纽带的凝聚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上团结奋进。

充分发挥道德文明的涵育功能，注重思想道德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结合，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创造必要条件。一方面，要切实普及公民道德建设。公民是国家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基础载体。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公民，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没有积极活跃、素质优良的社会主义公民，民主政治和伦理道德就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必须通过富有实效的公民道德建设，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和完善公民素质，使全体社会成员认同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认知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牢固树立民主法治观念和自由平等精神，激发自律的主体精神，激发深厚的民主活力，切实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深厚基础，创造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

另一方面，要切实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道德建设。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既是人民的公仆和社会的表率，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的中坚载体。江泽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sup>[8]</sup>腐败蔓延，将会导致社会成员信仰体系坍塌、人民群众离心离德，社会发展失去希望，因而是国家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死敌。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道德高尚、政治坚定，将使国家、民族有依靠的栋梁，人民获得坚强的信心、力量。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道德建设既是反腐倡廉的重要途径，也是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成败的关键。

坚持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融互动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和实践“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力戒片面性。在当前推进“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实践中，存在两种错误的思想偏向：一种是以法斥德，另一种是以德抑法。两种倾向均应纠正，就要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汲取中外文明传统精华，坚持德法并举，使二者不分先后、高低、轻重，在实践中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在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中，不断充实和扩展其道德内涵底蕴，充分发挥道德的基础和先导作用，使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民主、人道等观念，切实做到抑恶扬善，并为道德文明建设良好“生态”环境。在思想道德建设中，努力把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在全社会形成知法、守法、护法的良好局面，对邪恶势力形成强大的威慑，铲除邪恶、犯罪滋生的土壤，从而建立起法治和德治共同调控的社会主义新型治国模式。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0页，人民出版社
- [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人民出版社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4]《列宁选集》第4卷，第38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5]《论语·为政》
- [6]《道德经》第54章
- [7]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第一版
- [8]《人民日报》，2001年9月27日第一版

（原文发表于《道德与文明》2002年第5期）

（作者简介：翁世平，海军工程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339号 邮政编码：430033）